

2009

跨国公司中国报告

王志乐 主 编
蒋 姮 副主编



2009 REPORT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09

跨国公司中国报告

王志乐 主 编
蒋 姮 副主编

2009 REPORT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IN CHINA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 跨国公司中国报告/王志乐主编.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5017 - 8993 - 1

I. 2... II. 王... III. 跨国公司—研究报告—中国—2009 IV. F279. 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87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孟庆玲 (电话: 13801106990)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巢新强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5 字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993 - 1/F · 7976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 电话: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41878

前言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次会议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整整走过了30年历程。

《2009跨国公司中国报告》的编撰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日子编撰跨国公司中国报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要求我们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以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如何互动。正如本书总报告所说,改革开放30年恰恰是跨国公司逐步进入中国的30年,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30年也恰恰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30年。30年来,跨国公司全面进入中国,在获取自身发展的同时,催生了中国现代企业和现代产业。30年来,中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与跨国企业合作,同跨国公司竞争,迅速成长和壮大。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实现了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与此同时,在我们编撰这本书时,起因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几乎无一幸免,都受到了这次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跨国公司如何应对金融/经济危机,我们如何发挥跨国公司在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更加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面对现实,我们可以从现实变化中开阔视野和胸怀,更加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从美好的前景中获取信心和力量,更加勇敢的面对挑战。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搜集和邀请有关专家撰写了一批专题报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随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制定和实施了全球战略。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吸纳和整合资源,在全世界范围打造产业链和产业系统。跨国公司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跨国公司如何展开全球并购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书的专题报告就跨国公司与金融危机、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全球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不少观点和结论十分发人深思。

本书搜集了18家全球著名跨国公司撰写的公司案例报告。这些报告有的回顾该公

司在华 30 年发展的经验;有的探讨在中国产业发展中跨国公司如何通过并购促进当地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有的则探讨在中国如何加强企业包括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责任。这些报告的共同点是充分肯定了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充分肯定了 30 年来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的互动过程。

从总报告、专题报告到公司报告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思路,即中国产业健康发展和经济持续繁荣有赖于企业的成长壮大,而中国企业的成长壮大有赖于国企、民企和外企等各种所有制企业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和相互融合。“祸莫大于无敌”,任何一类企业真正做大做强都不可能在排除竞争对手的条件下实现。我们既不应该以“姓社姓资”排斥民营企业,也不应该以“姓中姓外”排斥外资企业。我们应当形成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本书又一次更新了全球 500 大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概览。按照这次更新,美国财富杂志排名的全球 500 大公司中不算海峡两岸的 35 家企业约有 300 家在华投资,他们在华一共设立约 3500 家企业。从企业数量看比前几年有了明显的增加。在金融危机中,许多跨国公司受到冲击,但是中国业务往往是他们的亮点。因此,不少跨国公司还在继续发展和扩大中国业务。只要我国经济保持相对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长,跨国公司可能进一步加大在华投资和经营。我们完全有可能发挥在华跨国公司企业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

作为主编,我感谢参加专题报告撰写的各位作者和各家企业,也感谢提供公司案例的各个跨国公司。与此同时,我感谢商务部研究院和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的诸位同仁。正是大家的努力,使得我们研究跨国公司的事业得以持续发展和深入。

希望读者能够利用这本书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也希望读者指出本书不足之处,以便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王志乐

于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

2009 年 1 月 20 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总报告

合作、竞争、融合

——跨国公司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3
一、闭关锁国使中国偏离全球化	3
二、突破思想禁锢,启动开放引资	8
三、突破“姓社姓资”,扩大开放引资	11
四、突破“姓中姓外”,坚持开放引资	17
五、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26
六、引导跨国公司融入可持续发展	32

第二部分 专题报告

发挥跨国公司在抵御金融危机中的积极作用	39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PE 在华投资的机遇	44
外资并购与产业发展和安全	52
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最新发展	57
跨国公司自愿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研究	66
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现状与趋势	72
浦东新区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	82
建设“和谐社会”中的新机遇	90
IBM:“智慧的地球”	94

第三部分 公司报告

思科:创新赢得未来	103
安赛乐米塔尔:全球企业的产业安全发展战略	107
三星:研发本土化与中国的企业公民	114
BP:CSR“1+N”模式实践	123
巴斯夫:创新社会责任发挥蜜蜂效应	132
3M:百年老店的创新本色	140
大众汽车:放歌中国 30 年	148
宝洁:用创新改写规则	155
沃尔玛:多方受益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供应链	165
卡特彼勒:使进步成为可能	176
戴尔:简化、节约、增长	182
杜邦先锋:科技育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186
微软:见证中国纪元	191
诺维信:构筑“生态社会”推动绿色经济	197
可口可乐: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同行	203
英特尔:本土化与共赢	210
拉法基:在中国的经营之道	215
百事公司:与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共成长	222

第四部分 附录

全球 500 大公司及其在华投资企业概览	233
30 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最近经营业绩	375

第一部分

总报告

合作、竞争、融合

——跨国公司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2009

跨国公司

中国改革开放

合作、竞争、融合

——跨国公司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 30 年历程。

改革开放 30 年恰恰是跨国公司逐步进入中国的 30 年,也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 30 年。30 年来,跨国公司全面进入中国,在获取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现代企业和现代产业。30 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向跨国公司学习,与跨国公司合作,同跨国公司竞争,迅速成长和壮大。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实现了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相互融合。

回顾过去使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更加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展望未来使我们从美好的前景中汲取信心和力量,更加勇敢面对挑战。

一、闭关锁国使中国偏离全球化

回顾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首先应当回顾近代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同时,还应当横向地进行全球比较,以全球化视角进行研究。我们研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应当从历史与全球这两个维度探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1. 经济全球化潮流与大国兴衰

综观历史,人类已经经历了 3 次经济全球化潮流。从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到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一次以贸易全球化为特征的全球化。从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中期,在差不多一个世纪时间里,对外投资成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特点。20 世纪 70 年代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则以金融资本全球化为特征。

每一次经济全球化潮流都是对原有世界经济格局的破坏,都意味着全球经济资源的重新整合。每一次全球化潮流都带来了新的技术革命和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新的生产力要素的形成。每一次全球化潮流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世界近代历史表明,经济全球化潮流与国家兴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地理大发现

后,世界越来越走向一个整体的世界。一个国家的兴起或衰落,一个经济体成长的快与慢,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发展的国家和经济体往往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新的来自全球的发展资源,例如资金、技术、能源、原材料以及市场。与此同时,它们也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竞争和挑战。历史证明,那些能够吸纳和整合全球经济资源的国家和经济体,那些能够迎接新挑战和竞争的国家和经济体往往崛起于全球化潮流之中,成为全球化中的强者。

第一次全球化潮流中的英国,第二次全球化中的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美国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反之,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中,偏离潮流甚至逆潮流而动的国家和经济体因不能吸纳和利用新资源,不能成功地迎接新挑战和新竞争,往往竞争力衰落,而使其在全球的地位下降。英国、法国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的衰落,原苏联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的衰落就是最深刻的教训。

2. 清帝国闭关锁国走向衰落

回顾我们中国在三次全球化浪潮中所处的位置及结果发人深省。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辉煌文明和强盛国力的中国由于偏离了前两次全球化浪潮而被边缘化。

当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兴起时,中国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进入了“康乾盛世”(1661—1796年)。在“康乾盛世”末期,当时中国人口达到3亿,耕地10.5亿亩,粮食年产2000亿斤;全球10个50万人口的城市中国有6个(京、江、宁、扬、苏、杭、穗)。当时的中国不仅农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常年出超。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商品贸易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正在形成。西欧地区开始了深刻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处在康乾盛世的中国统治者不仅没有顺应全球化潮流,反而偏离甚至逆潮流而动。这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面对西方兴起的资产阶级商业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中国已经全面落后。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其编撰的《落日的辉煌》一书中,对清王朝统治者的闭关锁国导致衰落的过程进行过深刻的剖析。该书指出:“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皇帝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

闭关锁国、拒绝开放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却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帝国将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不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

《落日的辉煌》一书还指出:清政府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其在对外交往中所持的排斥态度。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只能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便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其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满清统治阶层兴起洋务运动。洋务派认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进行变通。他们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武器以抵御外来侵略。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但是,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却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主张“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抵抗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是“以夷变夏”,要毁弃中国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更由于当时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统治者改革和开放,致使洋务运动难以深入,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面对英国等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西方国家屡战屡败,一次次被迫割地赔款,国势遂一蹶不振。

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总结中国历史教训。他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

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不了我们。”(《邓小平文选》3,P90)

3. 文化大革命中自我封闭发展停滞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时是主张开放引资的。早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的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欢迎的”。(1945年中共七大讲话)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只能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放。中国从前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重大项目。为掌握技术,从1949—1960年,我国聘请来华专家2万人,出国留学实习1万人。

李岚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指出:“当时,我们对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开放和经贸交流却有了很大发展。因此,这种选择还不能说是完全‘闭关自守’,只能说是推迟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李岚清,《突围》P12)

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在1个月内撤走在华所有专家,撕毁600份合同。前苏联援助停止,导致当时我国250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停顿。这一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从此,中国人不得不“自力更生”,完全靠自己的资源发展经济。

帝国主义封锁,前苏联停止援助,使中国从外部世界获取经济发展资源的途径基本上被堵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进一步把中国同世界隔绝了。

当时著名的“风庆轮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为了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总理做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1970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当时中国自行研制的9艘万吨级货轮中的1艘。1973年底,风庆轮建成,经轻载试验,柴油机主机一号汽缸磨损8丝,接船单位交通部远洋局认为风庆轮同设计要求有差距,为安全起见,提出先跑近洋运输。为此,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在姚文元、马天水支持下,污蔑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崇洋公司”,并于1974年3月22日召开批判“崇洋媚外”大会。江青借此批“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指责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是“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矛头直接针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邓小平同志历数引进技术设备和开展补偿贸易的好处,但仍然遭到“四人帮”的攻击。1976年2月,张春桥攻击进口成套乙烯装置、出口原油的

做法,污蔑邓小平同志是“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1976年3月2日,江青把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花骂为“汉奸行为”,污蔑邓小平是“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姚文元在1976年4月25日和5月24日两次谈话中,则把出口原油、煤炭,进口成套技术设备,说成是“转嫁资本主义石油危机”,是“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政策”,“完全是卖国主义”。江青一伙把出口原油,进口化肥、化纤等成套设备说成是“洋奴、卖国、汉奸”行为,攻击“外贸部有一批卖国主义者”,“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上叙述引自李岚清,《突围》)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反修防修”这种把经济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喧嚣中,中国进入了自我封闭时期。

1984年,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历史上偏离世界发展主流的教训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30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3,P64)

4. 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中国和平崛起

闭关锁国使中国错过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则使中国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机遇。

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美元贬值开始全球自由兑换标志着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从10年文化革命的动乱中走出来。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和刚刚兴起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果断地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使中国得以吸纳和利用了第三次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资源。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开始出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潮流迅速扩展。过去的跨国经营企业现在开始了全球化经营。许多跨国公司开始转变为全球公司。当跨国公司把国际市场扩展到全球市场时,改革开放的中国成为它们全球网络中重要的节点。跨国公司面对全球化纷纷把价值链中,加工组装等附加值低的环节转移到市场大、劳动力便宜的国家。中国颇具潜力的庞大市场以及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吸引跨国公司的巨大优势。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邓小平高瞻远瞩,发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给中国带来的新机遇。1992年初,邓小平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邓小平文选》三,P375)邓小平在强调抓住新机遇同时,明确提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要求。其中特别强调了扩大吸收外资规模。

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公司责任。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得到更加迅速的推进。就在 2001 年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扩展之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又一次抓住机会,不失时机地加入 WTO,开始了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入世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球经营网络。入世 7 年,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急剧加强的 7 年,是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急剧提升的 7 年。

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完全吻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之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之时,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之时,中国入世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中国都处在世界的前沿。

回顾历史,200 多年来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都没有像这次这样顺应潮流,融入潮流,还走在时代的前列。放眼全球,还没有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同中国这样把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结合的如此紧密如此合拍。

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紧密结合,同步发展,我们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中国成为吸纳全球资源最多最及时的发展中大国,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国实现了以和平的公平的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全球资源,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增添了崭新的一章。

二、突破思想禁锢,启动开放引资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决定改革开放。改革首先是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则是引进和利用外资。

1. 30 年来外资在华发展的总体趋势

引进外资是我国 30 年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引进外资从起步到扩大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1979—1991 年可以作为第一阶段,从 1992—2001 年是第二阶段,2002 年以来则是第三阶段。(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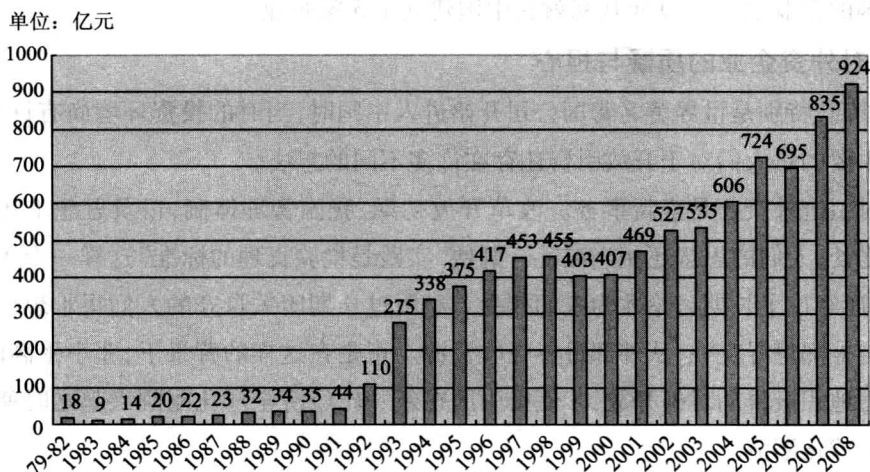


图1 1979—2008年我国吸收跨国投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历年外资统计数据整理

从以上外资发展趋势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引进外资数量曲线正好呈现三个发展阶段。从1979—1991年,外资数量不多,每年不过20~30亿美元。从1992—2001年外资数量出现第一个高峰,达到400多亿美元。从2001—2008年,外资数量逐年迅速攀升,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我国吸收外资突破900亿美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中把在华外资视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因此,本文在论述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时使用的统计数字与外资数字共用。)

跨国公司在华经历每一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回顾30年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一样,跨国公司在中国每一阶段的发展都需冲破种种阻力。

2. 1979—1991年外资在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我们对外宣布欢迎外商,但是最初几年只有少数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而且这些投资多数是小规模的试验性投资。

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外资企业是1980年4月10日批准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北京建国饭店公司和北京长城饭店公司。这些早期合资企业规模小、投资少,且主要是港商。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开放初期也开始了他们最早的投资。美国国际集团AIG于1979年开始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探讨建立合资保险公司问题。1980年9月,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了“中美保险公司”。1980年12月AIG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成为首家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国际保险金融机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重返中国,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就把可口可乐饮料送进广州的酒店。西门子从1982年起在北京开设了代表处,随后又在广州、上海和沈阳增设了3个地方代表处。日本三洋公司也是最早

进入中国的企业之一。80年代初就在中国建立了5家企业。

3. 对外资企业的质疑与担心

当外商,特别是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时,当时的投资环境尚有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们对于开放引资还存在许多不同的想法。

当时引进外资还是全新事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管理体制,以及思想上还有许多不适应之处,人们的思想还相当混乱。即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个无须证明的公理,还经过了长期讨论才为人们接受。经历过长期闭关自守的人们很难想像通过对外开放与外部世界交往,从外部世界吸收资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高瞻远瞩,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对外开放,才使得中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刚刚兴起之时就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

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参与了我国最初的引进外资的工作。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当时在与外商谈判合资时,中方普遍的心态是小心翼翼,怕吃亏,怕上当,怕被人说成是“洋买办”、“资产阶级代理人”,甚至把谈判看做是特殊的阶级斗争,把谈判桌作为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前线阵地”,在谈判时满脑袋装的都是我们单方面的利益。(见《突围》P259)

例如,北京引进外资建立合资饭店就招来许多批评。有人认为“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吗!”“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李岚清同志认为,当时所争论的还不仅仅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了。(见《突围》P243)

4. 突破思想禁锢积极开放引资

邓小平等老一代改革家以大无畏的创新思维,坚定不移的推动改革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揭示了中国历史上闭关自守,偏离世界发展潮流的教训,反复强调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文选》1,P88)

1979年8月视察天津时邓小平对市领导说:“发展生产力,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搞四化,搞合资经营,在过去,帽子是很大的。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都可以扣上。现在,有人说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社会主义,只搞资本主义。道理很简单,关